

## 論唐德宗朝的進奉\*

廖賢娟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 摘 要

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戰亂期間的破壞，亂後藩鎮割據與租稅不入中央，使唐帝國財賦來源大減，相對的，軍費支出卻大增，財政問題始終困擾著唐中央政府。起源於肅、代二朝的藩鎮進奉，逐漸成為挹注財政缺口的重要來源，大曆初，藩鎮貢獻已漸成常態。德宗即位後數年間，兵連禍結、財政困窘，亂定之後，德宗對財政匱乏危機感日益增加，導致「進奉」之風盛行，德宗對藩鎮進奉來者不拒，一方面可充正常稅賦體制之額外收入，一方面又可假藩鎮之手行聚斂之實，藩鎮以此固寵，德宗亦藉此操控臣下。其後不論中央系、安史系、江淮財賦區、西部貧困區，均競相進奉。藩鎮進奉之錢物必取自轄區百姓，人民生活之苦，則不暇聞問，上下交征利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唐帝國的政治與社會穩定性。

**關鍵辭：**藩鎮、進奉、趙贊、陸贄、楊炎

---

\* 本文 2007.09.20 收稿，2007.12.05 通過刊登。  
感謝《止善》學報第 3 期兩位匿名論文審查人惠予本文指正

## 一、前言

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捩點，八年戰禍雖然暫息，但是藩鎮割據形勢並未改變，加上接踵而來的宦官專權、兩蕃侵擾，在在困擾唐帝國的統治者。廣德元年（西元 763）吐蕃陷長安，代宗幸陝。後吐蕃退去，外患之危暫時解除，內憂卻方興未艾。安史戰亂的破壞，藩鎮的割據、河北賦稅不入中央，唐廷財賦來源大減，與此同時，軍費支出卻大增，使得財政問題始終糾纏著唐中央政府。

德宗生於天寶元年（742），以三十八歲（779）的盛年即位，安史之亂及亂後之種種困境，均曾親歷、目睹或聽聞。即位之後，亟思有所作為，唯其個性剛愎、貪吝、舉措失當，獨思改變藩鎮擅自繼襲之風，導致河北藩鎮俱叛、涇原兵變，德宗一幸奉天，再幸梁州，連年征戰對原本已左支右絀之財政，無異雪上加霜。德宗為解決財政問題，除了做稅制的改革之外，復重用聚斂之臣、增加稅收項目，導致民怨蠱起，非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製造更多社會問題，可謂治絲益棼，其所遇困境，誠如王吉林教授所述：「全由其軍隊與財政所引起」。<sup>1</sup>

唐玄宗朝始有財政官員大筆進奉財富情形，以應玄宗奢華生活所需<sup>2</sup>，而藩鎮進奉則起源於肅、代二朝，標顯自德宗時期，成為挹注財政缺口的重要來源。雖然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初期國事多艱，需財孔急，聚斂猶可理解，但是，內憂外患暫告平息，德宗對財利之事仍無罷手之跡象。德宗對藩鎮進奉來者不拒，一方面可補正常稅賦體制之不足，一方面又可假藩鎮之手行聚斂之實，藩鎮亦以此邀寵。藩鎮進奉之錢物必取自轄區百姓，人民生活之苦，則不暇聞問。上下交征利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唐帝國的政治與社會穩定性。

近年來史學界曾討論唐代進奉問題，先後有 1985 年陳明光，〈論唐方鎮的“進奉”〉、1986 年張澤咸，〈唐代賦役史草〉、1987 年張國剛、楊志玖，〈唐代藩鎮進奉試析〉、1995 年鄧慧君，〈唐德宗統治時期進奉探析〉，以及 2005 年彭

<sup>1</sup> 王吉林，〈唐代宰相與政治〉（臺北：文津，1999），頁 260。

<sup>2</sup> 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70 年 1 月 3 版）卷 105，頁 3229，〈王鉞傳〉載：「古制，天子六宮，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沿於周、隋，妃嬪宮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而給授，以供衣服鉛粉之費，以奉於宸極。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鉞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賚。鉞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玄宗以為鉞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

文峰，〈唐朝河朔藩鎮進奉淺論〉，各有其著重點與貢獻。本文重點除了論述德宗時藩鎮、財政問題、君臣權力關係外，更偏重在民生疾苦上。本文所徵引史料，如相同題材雜見《資治通鑑》、《兩唐書》，經比對無大出入或疑義者，以《資治通鑑》為主，蓋以《資治通鑑》雖完成時間較晚，在史料時間位階上，不若《兩唐書》之原始，但引書眾多，考證精詳，可謂後出轉精，本文為行文流暢，在資料運用上，不一一排比列出。

## 二、唐德宗朝面臨的財政問題

德宗即位後之種種政策宣示<sup>3</sup>，及雷厲風行的作為，確實能讓人耳目一新，然許多措施未經審慎評估，即貿然推動，導致河北、淮西連兵，加上德宗昧於現實、吝於給賜，復引發涇原兵變；又惑於奸臣，激起懷光叛唐。接連而來的戰亂導致唐中央政府的軍需、財政陷入極大的困境，而百姓亦難免戰禍及橫征暴斂之摧殘。陸贄在〈論關中事宜狀〉論及當時軍需財政困難狀況云：

……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sup>4</sup>

又在〈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論及將帥之需索更甚，而百姓之生活日艱：

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誣誤，內蓄危疑、倉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為姦逆以僭

<sup>3</sup> 《舊唐書》卷12，〈德宗本紀〉上，頁321-322載：「(大曆十四年)六月己亥朔，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天下進獻，事緣郊祀陵廟所須，依前勿闕，餘並停。諸州刺史上佐今後准式入計。諸州刺史、常參官，父在未有官，量與五品致仕官；父亡歿，與追贈。自至德已來別敕，或因人奏，或臨事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書門下與詳定官決，取堪久長行用者編入格條。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己未，揚州每年貢端午日江心所鑄鏡，幽州貢麝香，皆罷之。」

<sup>4</sup> 見唐·陸贄著、宋·郎晔評註，《陸宣公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印行，1970年6月臺一版)卷1，〈論關中事宜狀〉，頁4-5。

地稱王者也。……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眾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只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裏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sup>5</sup>

朝廷無法解決藩鎮割據的局面，讓奉派討伐叛亂的軍閥有了勒索中央政府的藉口，德宗有見於國庫匱乏，乃轉向百姓需索，由此觀之，唐中期的財政問題，實關係著帝國統治基礎穩定性。

### （一）安史之亂後的財政包袱

安史之亂對於黃河中下游的破壞相當嚴重，《舊唐書》卷 120，〈郭子儀傳〉載：「……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嘯；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sup>6</sup>《新唐書》卷 51，〈食貨志〉載：「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及兩京平，……而百姓殘於兵盜，斗米至錢七千，鬻糶為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sup>7</sup>。亂平之後，創痍未復，而藩鎮的割據勢力，又日臻強大，賦稅不入中央，形同獨立，中央不能罷兵，「食出界糧」制讓原就支出浩繁的軍費更形龐大，致使常賦不能供<sup>8</sup>。加以外患相繼<sup>9</sup>，「聯回抗吐」

<sup>5</sup> 見唐·陸贄著、宋·郎晔評註，《陸宣公集》卷 1，〈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頁 6-7。陸宣公憂國憂民之章奏甚多，茲不一一引述。

<sup>6</sup> 見《舊唐書》卷 120，〈郭子儀傳〉，頁 3457。

<sup>7</sup> 見《新唐書》卷 51，〈食貨志〉，頁 1347。

<sup>8</sup> 《資治通鑑》（臺北：宏業書局縮印本，民國 67 年 5 月 1 日再版）卷 228，〈唐紀〉44，建中四年六月條，頁 7346 載：「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才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

<sup>9</sup> 吐蕃趁安史之亂陷河西、隴右之地，《資治通鑑》卷 223，〈唐紀〉39，代宗廣德元年七月條，頁 7146 載：「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長安，大肆劫掠，《資治通鑑》卷 223，〈唐紀〉39，代宗廣德元年十月條，頁 7151-7152 載：「戊寅，吐蕃入長安，……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新唐書》卷 53，〈食貨志〉，頁 1374 載：「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

外交政策的施行<sup>10</sup>，使得唐中央政府財政，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如何解決財政困難，便成為當務之急，也為聚斂之臣，提供一展身手的舞臺，如戶部侍郎韓滉，《資治通鑑》卷 224 載：

（大曆六年）是歲，以尚書右丞為、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sup>11</sup>

韓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但其作用似僅止於節流，唯開源與節流並重，方能紓解財政的困境。面對安史之亂後戶籍、地籍、租賦制度的破壞<sup>12</sup>，楊炎兩稅法之提出，企圖徹底解決財政問題，從《舊唐書》卷 118，〈楊炎傳〉載「兩稅法」改革之主要目標：「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誠而姦無所取」。<sup>13</sup>可知：該稅改是希望由法律來規範徵收內容，防止藩鎮胡亂收稅等，以便安定百姓生活。

雖然兩稅法用以確立中央與藩鎮之間的財賦實行上供、留使、留州的三分定額制，企圖加強管理中央與地方的稅收，不過藩鎮勢力仍強大，稅改不久，

<sup>10</sup> 《新唐書》卷 51，〈食貨志〉，頁 1348 載：「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另見傅樂成，〈回紇馬與朔方兵〉，（收入《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 9 月第三次印行），頁 308-309 載：「當時唐室財政困難，代宗被回紇馬弄得焦頭爛額，拿不出絹來，只好賒賬，因此欠了回紇許多的馬債。德宗建中三年(782)，回紇曾要求唐室償還所欠馬值絹一百八十萬疋，至於代宗時與回紇『現金交易』所用去的絹究有多少呢？史書並沒有確實數目記載。」

<sup>11</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4，〈唐紀〉40，代宗大曆六年九月條，頁 7218。

<sup>12</sup> 《舊唐書》卷 118，〈楊炎傳〉，頁 3421 載：「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饑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因緣為姦，或公託進獻，私為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由前引文知，唐政府財政收入短絀，四方賦稅無法完全掌握，貪官污吏貪緣為姦利，巧立名目，侵蝕國家稅基，而百姓更遭重稅壓迫而逃亡，國家從戶籍、地籍、租賦制度進行改革，但無法立解燃眉之急。

<sup>13</sup> 見《舊唐書》卷 118，〈楊炎傳〉，頁 3422。另《資治通鑑》卷 226，〈唐紀〉42，德宗建中元年正月條，頁 7275-7276 所載略同，「兩稅法」以及相關苛捐雜稅之置與廢，因非本文主題，故不贅論。有關唐代賦役可參考張澤咸，《唐五代賦役史草》，（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6 年 10 月第一刷）。

即發生四鎮之亂與涇原兵變，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兩稅法的實施<sup>14</sup>。又，徒法不能自行，要徹底解決財政困窘問題，牽涉至廣，非短期即可奏效，但軍閥錢穀不能少，地方貪吏尙難查，爲解燃眉之急，建中、貞元年間，德宗在兩稅法之外，復提高商稅、削減官員薪俸、借商人錢，以助削藩軍費，如《資治通鑑》卷 226 載：

（建中二年）五月，丙寅，以軍興，增商稅爲什一。<sup>15</sup>

《舊唐書》卷 12 載：

（建中）三年春正月乙卯朔。丙寅，幽州節度使朱滔、張孝忠破李惟岳之兵於束鹿。辛未，詔供御及太子諸王常膳有司宜減省之，於是宰臣上言，減堂廚百官月俸，請三分省一以助軍，從之。<sup>16</sup>

《資治通鑑》卷 227 載：

（建中三年四月）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餽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並借商所得，才二百萬緡，人已竭矣。<sup>17</sup>

這些借商措施所斂聚的杯水車薪，非但無助於緩和財政緊張情勢，更引起民

<sup>14</sup> 鄧慧君，〈唐德宗統治時期進奉探析〉，《青海師專學報》第 4 期（1995），頁 29。

<sup>15</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6，〈唐紀〉42，德宗建中二年五月條，頁 7299。

<sup>16</sup> 見《舊唐書》卷 12，〈德宗本紀〉上，建中三年正月條，頁 331。

<sup>17</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7，〈唐紀〉43，德宗建中三年四月條，頁 7325-7326。

怨，德宗於建中三年下詔罷之。又《資治通鑑》卷 232 載：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之。<sup>18</sup>

《資治通鑑》卷 232 載：

（貞元三年五月）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sup>19</sup>

由上引史料知德宗初期國力之疲敝，財政壓力之大，故其聚斂之急亦可理解。

## （二）德宗擴大稅基以解決財政問題

因應國家財政困難最直接方式就是增稅，安史之亂以來，北方人民屢遭兵禍，復受藩鎮剝削，死者固然不幸，生者亦難喘息。德宗初年，藩鎮連兵之際，起用趙贊，大肆聚斂以濟軍需，《舊唐書》卷 48，〈食貨志〉上載：

德宗朝討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趙贊司國計，纖瑣刻剝，以為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蓄。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產，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為欺罔，遂行其計。中外沸騰，人懷怨望。時又配王公已下及嘗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囂然矣。後又張滂、裴延齡、王涯等，剝下媚上，此皆足為世戒者也。<sup>20</sup>

趙贊甚至假借常平倉備水旱之名加稅，但終不能充常平本。《舊唐書》卷 49，〈食貨志〉下載：

（建中）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糴鹽米，雖經頻

<sup>18</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2，〈唐紀〉48，德宗貞元元年八月條，頁 7460。

<sup>19</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2，〈唐紀〉48，德宗貞元三年五月條，頁 7485。

<sup>20</sup> 見《舊唐書》卷 48，〈食貨志〉上，頁 2087-2088。

年少雨，米價未騰貴，此乃即目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斗疋段絲麻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其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國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時而盡，終不能為常平本。<sup>21</sup>

趙贊巧立名目，刻剝搜括，未能抒解財賦不足壓力，反而累積更多的民怨。

江淮以南、四川地區，雖稍免兵燹，亦難逃重稅之壓迫。為增加國庫收入，增稅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舊唐書》卷 48〈食貨志上〉載：

（建中）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貞元）八年四月，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皋奏請加稅什二，以增給官吏，從之。<sup>22</sup>

增稅之外，對天下之山澤林藪、民生必需品均課以稅。《舊唐書》卷 49，〈食貨志〉下載：

其年（建中三年）詔曰：「天下山澤之利，當歸王者，宜總權鹽鐵使。」……（建中）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茶之有稅，肇於此矣。<sup>23</sup>

《舊唐書》卷 49，〈食貨志〉下載：

建中三年，初權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

<sup>21</sup> 見《舊唐書》卷 49，〈食貨志〉下，頁 2125-2126。

<sup>22</sup> 見《舊唐書》卷 48，〈食貨志〉上，頁 2093。

<sup>23</sup> 見《舊唐書》卷 49，〈食貨志〉下，頁 2118。



委州縣綜領。醵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權。<sup>24</sup>

此外，趙贊復建議實施大田法、稅屋間架、算除陌錢，所刮不多，卻導致民情騷然，德宗不得已於興元二年正月（785，興元二年，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貞元），全部停罷。<sup>25</sup>

聚斂方式雖多，但收穫不大，其根本原因在聚斂之臣昧於現實與官僚集團的人謀不臧，《資治通鑑》卷 234 載：

（貞元八年八月）陸贄上言，……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絀紵充直。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為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sup>26</sup>

聚斂的目的在增加財政收入，但在執行過程中，不論何種職務、何種身份，反趁機漁利，朝廷非但未蒙其利，百姓更受其害，可謂雙輸。

### 三、唐德宗之好利與藩鎮進奉

德宗即位後數年間，兵連禍結、財政困窘，涇原亂定，德宗對鑾輿播遷之

<sup>24</sup> 見《舊唐書》卷 49，〈食貨志〉下，頁 2130。

<sup>25</sup> 見《舊唐書》卷 49，〈食貨志〉下，頁 2127-2128 載：「建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為非便，皆寢不下。復請行常平稅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算除陌錢。間架法：凡屋兩架為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驗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罷。」

<sup>26</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4，〈唐紀〉50，德宗貞八年春八月條，頁 7534-7536。

苦刻骨銘心，財政匱乏危機感日益增加，聚斂之臣遂肆其惡行於百姓而邀寵於德宗。

德宗之好利及對財政上之匱乏恐懼感，自有其歷史背景。代宗朝經歷安史之亂、吐蕃入寇，軍人地位與重要性日益提升，重要軍區軍閥遂以軍需為藉口，不斷向百姓壓榨，向中央需索。龐大的軍需，造成中央政府財政的龐大壓力，地方首長的貢奉，便成了挹注財政缺口的一項重要來源<sup>27</sup>。藩鎮進奉起源於肅、代二朝，嗣後成為唐帝國挹注財政缺口的重要來源，大曆初，藩鎮貢獻已漸成常態。如《資治通鑑》卷 226 載：

（建中元年四月）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sup>28</sup>

「貢獻多者則悅之」實為代宗當時對藩鎮與地方官吏「四節進奉」的心境最佳寫照。

然大亂之後，戰區殘破，稅收大減，理財專家之重用<sup>29</sup>，江淮財賦之榨取與轉運<sup>30</sup>，關乎唐政權能否維繫下去。由此可以看出唐中央政府對財賦的渴求與掌控，產生極大的壓力，遂至代宗只問錢穀不問蒼生的失態表現，《資治通鑑》卷 223 載：

（永泰元年）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

<sup>27</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3，〈唐紀〉39，代宗永泰元年春三月條，頁 7173 載：「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擁兵者第館互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sup>28</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6，〈唐紀〉42，德宗建中元年四月條，頁 7280。

<sup>29</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3，〈唐紀〉39，代宗廣德二年二月條，頁 7164 載：「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議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授穗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sup>30</sup> 江淮為唐帝國命脈之所繫，論者多矣，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收入《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1976 年 3 月）第四章，頁 310-344，已有詳細論述，茲不贅。

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諝，寬之子也。<sup>31</sup>

大曆元年（766）周智光之亂，聚兵商山劫掠藩鎮貢獻<sup>32</sup>，由此知大曆初，藩鎮貢獻已漸成常態。大曆元年（766）十月，代宗生日，藩鎮進獻，常袞諫宜杜絕此風，而代宗不聽，《資治通鑑》卷224載：

（大曆元年）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值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上不聽。<sup>33</sup>

代宗對藩鎮貢獻的態度，給予地方首長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自是藩鎮假借生日節日、入覲調動、助軍助賞、皇帝宣索等名目，進奉以固寵，上下交征利，習以為常，遂至不能改<sup>34</sup>。肅、代二朝，因需錢孔急，藩鎮進奉是重要收入，藩鎮錢帛，必取之於百姓，而藩鎮所括之數額，又恐數倍於進奉之數，德宗即位之初，江淮即爆發巨額貪污案，然此只冰山一角，因為長期以來，官吏貪污已成常態。《資治通鑑》卷226載：

（建中元年九月）大曆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觀察使路嗣

<sup>31</sup> 見《資治通鑑》卷223，〈唐紀〉39，代宗永泰元年四月條，頁7174。

<sup>32</sup> 見《資治通鑑》卷224，〈唐紀〉40，代宗大曆元年春正月條，頁7188。

<sup>33</sup> 見《資治通鑑》卷224，〈唐紀〉40，代宗大曆元年春冬十月條，頁7192。

<sup>34</sup> 《舊唐書》卷48，〈食貨志〉上，頁2087-2088載：「先是興元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皋劍南有日進，李兼江西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緯李錡浙西，皆競為進奉，以固恩澤。貢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節度使或託言密旨，乘此盜賣官物。諸道有謫罰官吏入其財者，刻祿廩，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為進奉。然十獻其二三耳，其餘沒入，不可勝紀。此節度使進奉也。其後裴肅為常州刺史，乃鬻貨薪炭案牘，百賈之上，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死於宣州，嚴綬為判官，傾軍府資用進奉。無幾，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習以為常，流宕忘返。」

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寓發之。冬，十月，己亥，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上初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sup>35</sup>

天下贓吏無法肅清，遂授宦官武將以藉口，德宗初即位雷厲風行的推動革新措施，自然難以為繼。而趙贊之稅間架、除陌錢法，復提供貪吏上下其手的空間，廣大百姓苦不堪言，以致「愁怨之聲，盈於遠近」<sup>36</sup>。次年（興元元年，784），德宗雖下令停罷<sup>37</sup>，但中央政府勢必另闢財源，李泌建議對違法聚斂之地方首長採取既往不究政策，使兩稅法重新步上正軌以徵集財賦，《資治通鑑》卷 232 載：

（貞元三年七月）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

<sup>35</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6，〈唐紀〉42，德宗建中元年九月條，頁 7289-7290。

<sup>36</sup> 《資治通鑑》卷 228，〈唐紀〉44，德宗建中四年六月條，頁 7346-7347 載：「（建中四年六月）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sup>37</sup> 《資治通鑑》卷 229，〈唐紀〉45，德宗興元元年春正月條，頁 7390-7392 載：「（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氓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椎鐵之類，悉宜停罷。』」

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sup>38</sup>

此雖一時權宜之計，然確能濟燃眉之急，為國庫積聚了資財；但德宗深恐不足，德宗之「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是其汲汲於財利之最佳註腳。

### (一)君臣共謀財利之默契

代宗時，第五琦為避京師豪將之需索，將左藏庫之金帛轉藏大盈內庫，以宦官掌之，國家公庫，轉為天子私房，代宗亦利其方便取給，原一時權宜措施，積久竟成慣例，其盈縮虛實至不能校。德宗登基，楊炎建議回歸制度，德宗同意，但仍保有部分私房<sup>39</sup>。只是德宗能掌握之經費大減，不安全感日增，而地方貢獻適填補此一財政及不安全感的黑洞。

建中初年，河朔藩鎮連兵，江淮諸道進奉成為政府軍需費用之所繫。《資治通鑑》卷 227 載：

（建中二年六月）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sup>40</sup>

大運河沿線節度軍鎮首長之態度與立場向背，實關係著中央政府的安危，而中

<sup>38</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2，〈唐紀〉48，德宗貞元三年七月條，頁 7492。

<sup>39</sup> 《資治通鑑》卷 226，〈唐紀〉42，代宗大曆十四年十二月條，頁 7273-7274 載：「（大曆十四年十二月）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sup>40</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7，〈唐紀〉43，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條，頁 7302。

中央政府對此區域人事的掌控，亦不敢有絲毫的大意，此部分因非本文主題，故不贅論。

德宗登基之後，處心積慮聚集財賦，並非完全由於內庫空虛，實因肅代時期戰亂導致財政困窘的印象，深烙在他的腦海中，此從涇原兵變，瓊林、大盈二庫所藏之豐厚可證。《資治通鑑》卷 228 載：

（建中四年九月）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翺犒師，惟糲食菜餒。眾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sup>41</sup>

另《資治通鑑》卷 228 載：

（建中四年十月）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歡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sup>42</sup>

《資治通鑑》卷 229 載：

（建中四年十一月）……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sup>43</sup>

<sup>41</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8，〈唐紀〉44，德宗建中四年九月條，頁 7351-7353。

<sup>42</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8，〈唐紀〉44，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條，頁 7354。

<sup>43</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9，〈唐紀〉45，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條，頁 7376。

由上引資料知涇原兵變、長安淪陷，庫藏經亂兵搶掠、朱泚揮霍，尚有餘裕，府庫之充實，出人意表，德宗之聚斂成果十分可觀。

當涇原兵變、長安淪陷，德宗被困奉天之際，資糧俱盡，德宗坐困愁城，有賴各地藩鎮輾轉進奉，暫解斷糧之困。《資治通鑑》卷 229 載：

（建中四年十一月）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渡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眾利之，西屯蒲城，有眾五萬。<sup>44</sup>

另《資治通鑑》卷 229 載：

（建中四年十一月）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皋數遣使開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荊、襄趣武關。皋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sup>45</sup>

德宗困居奉天，地方財賦貢獻，尚遭受各地軍閥劫掠，能突破沿途艱難險阻，到達奉天者，誠屬不易。

隨著諸道貢獻續至，德宗將此些進貢錢穀存於行宮廡下的私庫，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大不以為然，上疏切諫，《資治通鑑》卷 229 載：

（興元元年正月）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鬥志，上疏

<sup>44</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9，〈唐紀〉45，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條，頁 7371-7372。

<sup>45</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9，〈唐紀〉45，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條，頁 7378-7379。

諫，其略曰：「……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sup>46</sup>

蓋自河朔倡亂以來，兵凶戰危，人饑馬疲，奉天之危機稍解，德宗對財政之匱乏恐懼感未除，以致對諸道貢獻管控得更緊，《通鑑》只記本條至「上即命去其榜」而止，疑德宗並未「出賜有功」。由另一個角度看，德宗由當時非淪陷區搜刮（藩鎮進奉）所得財物十分富厚。

德宗初期飽受兵禍導致錢穀匱乏之折磨，亂後，以姑息藩鎮的方式換得穩定局面，但其對藩鎮的貢獻卻也無法忘懷，在貞元年間繼續推行兩稅法徵歛國庫財賦的同時，德宗仍接受地方藩帥或官員，如江西觀察使李兼、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常州刺史裴肅、宣州判官嚴綬等的「稅外方圓」、「用度羨餘」等進奉，變相聚集資財。《資治通鑑》卷 235 載：

（貞元十二年六月）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sup>47</sup>

德宗曾自述其乃因宮廷經費不足而納進奉，但從下列引文不難得知，「宮中用度不足」實非德宗好進奉的充分理由，《資治通鑑》卷 233 載：

<sup>46</sup> 見《資治通鑑》卷 229，〈唐紀〉45，德宗興元元年正月條，頁 7396-7397。

<sup>47</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5，〈唐紀〉51，德宗貞元十二年六月條，頁 7572。



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上從之。<sup>48</sup>

翌年二月，德宗猶數有宣索，李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sup>49</sup>。國君宣索情景，不但令宰相李泌不敢再言，亦使官員得以超授官資，藩帥得以邀幸固寵。而德宗對淮西之反叛及貢賦不入中央，懷恨在心，貞元八年（792），河、淮、江大水，德宗以不遣使賑災做為報復，幸為陸贄勸阻。《資治通鑑》卷 234 載：

（貞元八年秋七月）河南、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sup>50</sup>

一國之君卻是如此好利的決策與作為，聞之令人駭異；即便有些史家認為其聚斂非為滿足個人揮霍的願望，亦難辭其不顧民命之譏。

德宗對錢穀之渴求溢於言表，予聚斂之臣極大的鼓勵與暗示。獻媚固寵者，不分地方與中央，而中央以裴延齡為最，《資治通鑑》卷 234 載：

（貞元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則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

<sup>48</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3，〈唐紀〉49，德宗貞元三年九月條，頁 7501。

<sup>49</sup> 《資治通鑑》卷 233，〈唐紀〉49，貞元四年二月條，頁 7510 載：「（貞元四年）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sup>50</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4，〈唐紀〉50，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條，頁 7533-7534。

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sup>51</sup>

《資治通鑑》卷 235 載：

（貞元十年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sup>52</sup>

裴延齡用盡心思、巧立名目，搜刮邀寵，而德宗亦深信之。德宗之不聽韋少華之言，不亦宜乎！

德宗另一斂財管道為宮市，宮市由宦官主持，為害更烈，兩京民情為之騷動，諫官屢諫，德宗仍不為所動。《資治通鑑》卷 235 載：

（貞元十三年）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sup>53</sup>

上下各取所需，聚斂市恩之風大盛，受害最深者厥為處於弱勢地位的百姓。

## （二）進奉與君臣權力關係

德宗初年固然兵連禍結，鑾輿數幸，但中央政府並未解體，唐室名號，仍

<sup>51</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4，〈唐紀〉50，德宗貞元九年秋七月條，頁 7548-7549。

<sup>52</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5，〈唐紀〉51，德宗貞元十年九月條，頁 7562-7563。

<sup>53</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5，〈唐紀〉51，德宗貞元十三年十二月條，頁 7578-7579。

足以凝聚非叛變藩鎮之向心力，於是出自中央政府之任命狀仍維持其一定效力，藉皇權迫使藩鎮向其進奉，並以此維繫中央與地方的政治臣屬關係，地方藩鎮亦以貢獻作為晉升之終南捷徑。其後不論中原諸道、江淮財賦區、西部貧困區以及河朔藩鎮，均競相進奉<sup>54</sup>。《新唐書》卷158，〈嚴震傳〉載：

（興元元年三月）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為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為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為興元府，即用震為尹，加實封二百戶。<sup>55</sup>

《資治通鑑》卷230載：

（興元元年四月）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故也。<sup>56</sup>

《新唐書》卷126，〈韓滉傳〉載：

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sup>57</sup>

建中四年（783），亂事方殷時，韓滉據守江東，雖為人所告，謂其別有意圖，但以貢獻不絕，又在李泌力保之下，終於獲得德宗恩顧<sup>58</sup>。而韓滉亦發揮其穩定江淮，力保貢賦不闕之功能，可謂君臣相得<sup>59</sup>。李錡以進奉得寵，錡因此而

<sup>54</sup> 見楊志玖、張國剛，〈唐代藩鎮進奉試析〉，頁129-130。

<sup>55</sup> 見《新唐書》卷158，〈嚴震傳〉，頁4943。

<sup>56</sup> 見《資治通鑑》卷230，〈唐紀〉46，德宗興元元年四月條，頁7424。

<sup>57</sup> 見《新唐書》卷126，〈韓滉傳〉，頁4435。

<sup>58</sup> 見《資治通鑑》卷231，〈唐紀〉47，德宗興元元年十一月條，頁7447-7449。

<sup>59</sup> 《資治通鑑》卷231，〈唐紀〉47，德宗興元元年十一月條，頁7450載：「（興元元年十二月）淮南

恣意妄爲，爲日後反叛種下禍因，《舊唐書》卷 112，〈李錡傳〉載：

（李）錡，以父蔭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為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sup>60</sup>

渾瑊以軍功著稱，亦受風氣影響，有進貢皆親自閱視，小心恭謹，故能以功名終，《資治通鑑》卷 235 載：

（貞元十五年）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甯王渾瑊薨於河中。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sup>61</sup>

以財物進奉固寵，對藩鎮而言是代價最少，收效最大的方式，且聚斂所得恐又數倍於進奉之數。君臣唯利是圖，惡果不少，更有甚者是維繫政治社會正常運作的法律正義，迭遭執政者破壞，例如有些司法案件可因進奉而減輕罪刑或豁免其法律責任，永州刺史陽履是著例也，《資治通鑑》卷 235 載：

（貞元十六年五月）湖南觀察使河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履表稱所斂物皆備進奉。上召詣長安，丁丑，命三司使鞠之，詰其物費用所

---

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sup>60</sup> 見《舊唐書》卷 112，〈李錡傳〉，頁 3341；另《資治通鑑》，卷 235，〈唐紀〉51，德宗貞元十五年二月條，頁 7582 載：「（貞元十五年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廄、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sup>61</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5，〈唐紀〉51，德宗貞元十五年十二月條，頁 7585。

歸，履對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所對率類此。上悅其進奉之言，釋之，但免官而已。<sup>62</sup>

另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布衣崔善貞上封事，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坑於道旁。己亥，善貞至，並鎖械內坑中，生瘞之」<sup>63</sup>。可見德宗重財利甚過人命，對藩鎮之刻剝百姓視若無睹。

其他如「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判官齊總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sup>64</sup>。「京兆尹（李）嗣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等<sup>65</sup>，各級官僚進奉固寵者甚多，不再一一列舉。德宗貞元以後，戰禍暫息，而藩鎮進奉卻日益增多，其原因固是藩鎮揣度德宗之心，而德宗之公然宣索，與以官職酬庸，更有以致之。

### （三）進奉與百姓生存關係

統治階級以進奉、官職為利益交換，雙方互謀其利，而百姓則有切膚之痛矣！安史亂後，北方殘破，復以水利失修，蝗旱為災，百姓生計日益艱困，未受戰爭波及的區域，亦難逃地方首長的壓榨，茲引數則史料說明之。《新唐書》卷158，〈嚴震傳〉載：

（興元元年三月）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sup>66</sup>

《資治通鑑》卷233載：

<sup>62</sup> 見《資治通鑑》卷235，〈唐紀〉51，德宗貞元十六年五月條，頁7589。

<sup>63</sup> 見《資治通鑑》卷236，〈唐紀〉52，德宗貞元十七年六月條，頁7596-7597。

<sup>64</sup> 見《資治通鑑》卷236，〈唐紀〉52，德宗貞元十八年正月條，頁7599。

<sup>65</sup> 見《資治通鑑》卷236，〈唐紀〉52，德宗貞元十九年十二月條，頁7604。

<sup>66</sup> 見《新唐書》卷158，〈嚴震傳〉，頁4943。

（貞元四年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sup>67</sup>

雖然貞元三年（787）豐收，百姓亦難得喘息，趙光奇的應對，指出兩稅法施行之後，額外增加的苛捐雜稅更多，下情在層層官僚體系中無法上達，縱使有詔書優恤，亦無法紓解生民的痛苦。如趙光奇之幸運者蓋寡，實亦無法全面顧及，《資治通鑑》卷 233 載：

（貞元三年十二月）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sup>68</sup>

德宗聚斂之臣巧立名目，剝削增稅之時，又往往以照顧百姓為幌子，如前述趙贊之常平本錢即是，後來張滂建議茶稅之開徵，本以補水災所減之稅，定制之後，並未嘗用於救水旱，亦是例証，《資治通鑑》卷 234 載：

（貞元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sup>69</sup>

聚斂之臣為投德宗所好，高壓榨取，雖有陸贄「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

<sup>67</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3，〈唐紀〉49，德宗貞元四年九月條，頁 7515。

<sup>68</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3，〈唐紀〉49，德宗貞元三年十二月條，頁 7508。

<sup>69</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4，〈唐紀〉50，德宗貞元九年春正月條，頁 7539-7540。

以民爲本做爲出發點的進諫，實難改德宗意向與聚斂風氣。《資治通鑑》卷 234 載：

（貞元八年八月）陸贄上言，「……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米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sup>70</sup>

另陸贄〈論關中事宜狀〉載：

……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sup>71</sup>

陸贄甚至以「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爲言，仍難改變聚斂之風。德宗對財政之匱乏感與對地方首長的需索，可謂積重難返。

#### 四、結 論

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戰亂的破壞，藩鎮的割據、河北賦稅不入中央，造成唐帝國財賦來源大減，復加上西北兩蕃的寇擾，軍費支出大增，財政問題始終困擾著唐中央政府。開源節流之外，起源於肅、代二朝的藩鎮進奉，漸成挹注財政缺口的重要來源。

<sup>70</sup> 見《資治通鑑》卷 234，〈唐紀〉50，德宗貞元四年九月條，頁 7543-7536。

<sup>71</sup> 見唐·陸贄著、宋·郎晔評註，《陸宣公集》，卷 1，〈論關中事宜狀〉，頁 5。

德宗對於安史之亂及亂後之種種困境，均有一定的瞭解。即位之後，確思有所作為，唯個性剛愎、貪吝、舉措失當，導致河北藩鎮俱叛、涇原兵變，鑾輿數幸。連年征戰，對原本已左支右絀之財政，無異雪上加霜。德宗為解決財政問題，除了做稅制的改革，復重用聚斂之臣、增加稅收項目，種種開源措施，非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製造更多社會問題，對唐代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可謂治絲益棼。

在四方賦稅無法完全掌握，貪官污吏腐蝕國家稅基，而百姓更遭重稅壓迫，德宗進退失據之餘，對藩鎮進奉倚賴更深。

藩鎮進奉起源於肅、代二朝，時內憂外患交逼而至，政府需錢日迫，藩鎮進奉是重要來源之一，德宗一朝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其後漸成慣例。自是藩鎮假借各種名目進奉，上下交征利，遂習以為常，至於不能改。藩鎮錢帛，必取之於百姓，而藩鎮所刮之數額，又恐數倍於進奉之數。

雖然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初期國事多艱，需財孔急，聚斂猶可理解，但是，內憂外患暫告平息，德宗對財利之事仍無罷手之跡象，實由於亂定之後，中央政府並未解體，唐室名號，仍足以凝聚藩鎮之向心力，且出自中央政府之任命狀亦能維持其一定效力，藉皇權迫使藩鎮向中央進奉，並以此維繫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係，加上德宗對財政匱乏危機感未除，聚斂之臣競相進奉以固寵，德宗亦得以權位操控臣下。藩鎮進奉之錢物必取自轄區百姓，人民生活之苦，則不暇聞問。上下交征利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唐帝國吏治的敗壞，助長藩鎮的經濟勢力，影響了唐帝國的政治與社會穩定性。

#### 參考文獻（依姓氏比劃排序）

- 王 溥，《唐會要》（臺北：世界書局，1982）  
王吉林，《唐代宰相與政治》（臺北：文津，1999）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書局，1978）  
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宏業書局縮印本，1978）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  
宋 綬、宋敏求，《唐大詔令集》（臺北：鼎文書局，1978）  
杜 佑，《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7）  
陳明光，〈論唐方鎮的“進奉”〉，刊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1期，1985。  
陸贄著、郎晔評註，《陸宣公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印行，1970）  
張澤咸，《唐五代賦役史草》（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6）  
彭文峰，〈唐朝河朔藩鎮進奉淺論〉，刊於《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3期，2005。



-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 楊志玖、張國剛，〈唐代藩鎮進奉試析〉，刊於《文史》28輯，1987.01。
- 鄧慧君，〈唐德宗統治時期進奉探析〉，刊於《青海師專學報》第4期，1995。
- 劉 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劉玉峰，《唐德宗評傳》（濟南：齊魯書社，2002）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Tribute to De-Tzung: a Brief Analysis**

**Liao, Hsien-Chuan**

**Lecture, Liberal Art Center, DaYeh University**

### **Abstract**

An-Shi Rebellion (安史之亂) is the turning point for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summit downward. Badly torn and partially occupied by local armies amid and after wa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Tang Dynasty failed to get taxes; tax incomes thereby largely decreased. Military expenses, however, immensely increased; the financial troubles had therefore kept troubling the government. Local armies had gradually become the origins of government incomes. De-Tzung (742-805A.D.), one emperor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awar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resulted from series of wars and financial mismanagement. He thus relied more on the tribute paid to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In the sense, officers related to the tribute affairs were trusted and thereby capable of grasping powers just for the kick of it. Tribute was thus paid by either Central government party, An-shi party, Zian-Hwi area, or western-poverty area. De-Tzung never resisted any tribute paid, which was considered one origin of tax income, and one origin of bribery as well. Badly spoiled, local armies bypassed the pains and tears of everyman. Local armies and Central imperial government both shook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ies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 Local Armies 、 to Pay Tribute 、 Zou Tsan 、 Lu Chih 、 Yang Yan**